



沧海蠡得

——陈洪自选集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学者文丛

90114662



沧海蠡得

——陈洪自选集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

9011466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海蠡得:陈洪自选集 / 陈洪著. —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4.10

(南开大学文学院著名学者自选集)

ISBN 7-310-02164-9

I. 沧... II. 陈... III. 古典文学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文集 IV. I206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0814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肖占鹏

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300071

营销部电话: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(022)23502200

*

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 插页 397 千字

定价:36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电话:(022)23507125



出版说明

为纪念南开学校建立一百周年暨南开大学建立八十五周年，我院特编辑出版这套“南开大学文学院学者文丛”。

南开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校，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它是以私学典范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教育中卓荦而立的。唯其如此，规模偏小、经费偏紧始终伴随着它发展的过程。但“南开难开，越难越开”，终于写下了值得自傲的百年历史。百年风雨，累积的经验很多，但足以使南开屹立于名校之林的首要经验是“学术精良”。所以，纪念南开百年，献上这部小小的丛书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学院。建院之初，我们就提出了“学术兴院”与“互补共荣”的方针，文学、语言、艺术、传播，在教学中由互补而形成特色，在学术上因互补而拓展思路。这部丛书所收便是文学、语言、艺术等各学科部分学者的著作。又因为纪念性出版，所以每人所选各随己意。学术论文为主自不待言，其他或兼有谈文论艺、自抒怀抱的小品点缀其间，以便读者切磋学术之余，也不妨近距离地一睹南开学人的风神。

愿南开之树常青。愿南开学术生生不已。

南开大学文学院

2004 年 8 月 2 日

目 录

内篇

1

一编书是帝王师

——论“诸葛范型”及其文化意蕴 / 3

《三国演义》之军事心理学论析 / 16

禅与侠的妙合

——鲁智深形象新论 / 30

牛魔王佛门渊源考论 / 41

从须菩提看《西游记》的创作思路 / 50

论《西游记》与全真之缘 / 58

《西游记》有关佛教的文字与版本繁简问题 / 76

《天雨花》性别意识论析 / 87

从朝市变迁看《林兰香》的创作年代 / 102

《红楼梦》中癡僧跛道的文化意蕴 / 108

论清初白话小说所折射的士林心态 / 116

长篇白话小说叙事艺术在明清之际的发展 / 130

我国长篇白话小说中宗教描写之人文主义传统 / 149

白话长篇小说中的象征手法及其文化语码解析 / 164

- 容与堂刊《水浒传》之李批真伪辨 / 184
- 论《维摩经》对李卓吾思想与文学批评之影响 / 199
- 金圣叹姓氏辨疑及其字号的思想文化内涵 / 216
- 金圣叹钱谦益“仙坛倡和”之文化心理透视 / 225
- “因缘生法”与金圣叹的小说创作观 / 237
- 从“三境”说看金圣叹美学思想之渊源 / 247
- 《三国》毛批考辨二则 / 261
- 从冯、但评点看《聊斋》中的“古文笔法” / 268
- 《文心雕龙》对《高僧传》之影响臆探 / 277
- 归庄文学思想述评 / 285
- 清初文论中的佛学影响 / 300
- 也谈中国文论的“失语”与“话语重建” / 315
- 一统或多元
- 谈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 / 330
- 对复兴儒学的困惑与思考 / 334
- 世纪回首：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 / 344
- 调和鼎鼐盐梅手
- 金庸作品雅俗论 / 357

外篇

363

- 学术：公私之间的天空 / 365
- 学风及学术规范问题断想 / 374
- 诗歌鉴赏六篇 / 379
- 小说鉴赏六篇 / 396
- 探测水面下的冰山
- 何宗美《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》序 / 414

拓展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新疆域

——鲍震培《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》序 / 416

打开一座富矿的大门

——萧占鹏《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》序 / 418

《浅俗之下的厚重》自序 / 421

《中国诗词名句赏析大典》序 / 424

《吴大任文集》序 / 426

材料为根，思辨为翼

——评张锦池《〈西游记〉考论》 / 428

南开论剑：金庸的作品有多伟大？ / 432

挑灯说金庸，把酒话江湖 / 455

萧峰：悲而不惨的武林英雄 / 463

“虚室生白”的江湖 / 466

西门庆与韦小宝 / 469

也许金庸先生会后悔 / 472

杂篇

475

四纪如何太匆匆 / 477

十年书缘说读书 / 485

达津先生轶事 / 488

镌石缘起 / 491

百年南开纪念碑记 / 492

留别在津诸友 / 493

登烟台山 / 494

夜半 / 494

送别有感 / 494

别友人 / 495	
呈鲁藜前辈 / 495	
怀想秉禾先生 / 495	
濠江咏荷 / 496	
题范曾先生之奇花 / 496	
赠金庸先生 / 496	
绍兴印象（三首） / 496	
谒禹陵（三首） / 497	
新疆行（八首） / 497	
白洋淀记游 / 499	
黄叶村 / 499	
长白天池 / 499	
成都行（四首） / 499	
过秦淮（三首） / 500	
柳如是墓 / 500	
南开校庆（母校九五华诞） / 501	

内

篇

一编书是帝王师

——论“诸葛范型”及其文化意蕴

毛纶父子批《三国》，把诸葛亮与曹操、关羽并称“三绝”，认为作者把他的奇绝才略写到了绝诣，而小说的艺术魅力亦大半由此而生。此说甚有见地，但稍有不足。作为一个艺术形象，诸葛亮的特色不仅在于才略奇绝，还在于其典型的“帝王师”角色。

所谓“帝王师”，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种理想，或是梦想，指的是士人的一种双重身份：既是君主的臣下，又是君主的导师——当然，更强调的是后一方面。《三国演义》塑造诸葛亮形象时，在这方面刻意倾注了大量笔墨。举其大要，有以下数端：

1. 改变历史事实，夸大诸葛亮的能力及功绩。作为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的精彩之处大半与诸葛亮的形象有关。自“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”，至“五丈原大星陨落”，近三十年间的历史完全围绕着诸葛亮展开。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，草船借箭、筑坛祭风、智算华容、三气周瑜等等，诸葛亮这些传奇式的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，有的甚至不惜掠他人之美。兹举一例以见其余：赤壁大战后，东吴

提出越荆取蜀的建议，据《三国志》，识破东吴用心并献计抵御的，是荆州主簿薛观，而“先主从之，（孙）权果辍计，迁观为别驾从事”^①。而据《献帝春秋》，则是刘备自行陈词拒吴，且亲自阻挡孙瑜（并非周瑜）的水军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诸葛亮的作用只是率一支偏师驻扎南郡而已。可是到了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全部功劳都算到了诸葛亮的账上。薛观其人固然无影无踪，刘备也变得极度低能弱智，只会不断向诸葛亮求教：“子敬此来何意”、“何以答之”、“此是何意”、“如之奈何”等等（第五十六回）。更有甚者，作者为突出诸葛亮，处处有意贬低他人以衬托之，如庞统、周瑜等形象，都成为这一创作意图的“牺牲品”——当然，从通俗小说的角度看，这亦无可厚非。

2. 贬抑刘备的能力与作用。在极力抬高诸葛亮的同时，作者刻意贬低刘备的能力，在二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。据《三国志》，刘备实为当世之豪杰，曹操称其为“英雄”，周瑜称其为“枭雄”，皆非虚誉。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》：“曹公问裴潜曰：‘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，卿以备才如何？’潜曰：‘使居中国，能乱人，不能为治。若乘边守险，足为一方之主。’”而到了《演义》中，刘备的才能、智力皆不足以当“枭雄”之目，特别是自得诸葛之后，更是急剧下降，有时甚至不如个小孩子。最典型的如第五十六回，周瑜设假道收荆之计，“孔明大笑曰：‘这等计策，小儿也瞒不过！’”刘备却一再追问“此是何意”、“又问如何”。这种过分的描写，连毛氏父子也看不过眼去，批道：“小儿瞒不过，大人倒不晓得！”对于史籍所载的刘备功绩，《演义》中或被故意忽略，或被移到孔明身上。如博望坡之火攻，《三国志》之《魏书·李典传》、《蜀书·先主传》均载为刘备亲自将兵，亲自设计；其他史籍并无异词，更无一语及于

^① 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。

孔明。《演义》却一股脑归功于孔明，以“初出茅庐第一功”大事铺陈。至于刘备所扮演的角色只是“以剑印付孔明”，看着孔明指挥调度而已。而诸葛亮对一切举措均不解释说明，使得刘备“亦疑惑不定”，全无置喙之余地。再如赤壁战后的抗拒东吴、率部西进图蜀等，皆属刘备的勋业，亦被罗贯中一笔抹去，甚至让其充当误事的角色，把事情弄糟后再由诸葛亮来收拾。

3. 着力渲染、夸张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。若据史籍，诸葛亮之于阿斗，称为“帝王师”庶几不远；而对于刘备，则不过一位杰出的辅弼而已。但在《演义》中，刘备也变成了诸葛亮的“阿斗”。这位“枭雄”自隆中聆教以后，对诸葛亮不仅是言听计从，而且完全丧失主见，成为被操纵的傀儡。最典型的如江东招亲一节，此事之始末见于《先主传》及《载记》，无论入吴就婚，还是摆脱牢笼归还，都是刘备自作主张。诸葛亮反而谏阻此行，意见未被玄德采纳。可到了《演义》中，刘备自始至终蒙在鼓里，先是担心“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”，而孔明却根本不顾其“怀疑未决”，“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”（第五十四回）。而后，刘备“怀疑不敢往”，“心中怏怏不安”，孔明却依然以“锦囊妙计”的方式调度着一切。一个锦囊又一个锦囊，孔明在千里外“裁处”、包办着婚姻的全过程，而玄德只能“依计行事”。这些情节很有趣味，但大不合于情理。书中此类描写还有不少，显然作者在心理上认同于诸葛亮，故极力把他塑造成“天人大导师”，而把刘备写成乖乖的小学生。我们遍览三国时期的史籍，孔明在刘备手下献策建功的记载甚少，他支配全局的作为几乎全在后主时代。可以说，演义悖于史实之处，莫此为甚。更为有趣的是，刘备得孔明之后本来也有失败

或挫折，如长坂坡^①、白帝城等，作者皆曲为孔明开脱，不仅使其“不在现场”，而且明确把责任归之于刘备偶然的“不听教导”。

综观《三国演义》全书，诸葛亮的形象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：

1. 书生出身而具有将略；2. 与君主关系甚洽；3. 事实上指挥、控制着一切。而当我们把眼光放远，便会发现，《三国演义》之后，中国小说史上陆续出现了一批类似的人物形象，如《水浒》之吴用、《女仙外史》之吕师贞、《野叟曝言》之文素臣、《说唐》之徐茂公等，甚至《封神演义》之姜子牙，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些特点。其中，吕师贞、文素臣的基本特点尤近于诸葛。因此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诸葛亮形象具有某种“范型”的意义。

研究形成这种“范型”的社会文化及作家心理方面的原因，是深入理解此类作品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二

若追踪于思想史，便会发现“帝王师”的观念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演变甚有瓜葛。孔子虽热衷于政治，对自己的身份却从未有过如此奢望。而到了孟子之时，则以“说大人则藐之”的气概，提出了“王者师”的主张。《滕文公上》：

……人伦明于上，小民亲于下。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是为王者师也。

表面看，这里“王者师”指滕国的善政，其实是指实行善政的人，即儒家政治理论的奉行者——孟子这样的人物。这层意思，他在《公孙丑下》中说得更明白：

^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：“（长坂大败）先主弃妻子，与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数十骑走。”可见长坂之败，亮同在军中。

……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

孟子认为，朝廷以爵禄为贵，而儒者以德行为贵，二者足相抗衡；有为的君主对待贤人，首先是“受教”、“学焉”，然后才是“臣之”。这种观点贯穿于整部《孟子》之中，成为其政治学说的一大特色。大要言之，孟子的“王者师”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：

1. 为人臣者可分两类，一类是供君主驱遣的普通臣子，人格上自然低于君主；另一类则是从仕的儒者，特别是自己这样的大儒，在人格上是与君主平等的。他举费惠公为例：“费惠公曰：‘吾于子思，则师之矣；吾于颜般，则友之矣；王顺、长息，则事我者也。’”（《万章下》）又奉尧、舜为楷模，称道其“天子而友匹夫”的作法，认为“用下敬上，谓之贵贵；用上敬下，谓之尊贤。贵贵尊贤，其义一也”。由此，他主张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（《离娄下》）。在另一面，他则提倡为人臣者要有独立的人格，斥责“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鼓吹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甚至主张“贫贱骄人”，“说大人则藐之”。

2. 大儒出仕，首要之责是以仁义之道教育、指导君主。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义利之辨，他反复痛斥导君以利的人物，明确提出：“君子之事君也，务引其君以当道，志于仁而已。”在应对梁惠王“将有利吾国乎”之问时，劈头便是“王，何必曰利！亦有仁

义而已矣”。在批评宋钘“以利说秦楚之王”以罢兵时，也是高倡“何必曰利”（《告子下》）。而显然，“曰利”者为顺君主之意，为仰承之势；“引君志仁”为逆责之势，须居于导师的地位。《孟子》中，梁惠王称“愿安承教”，齐宣王请孟子“明以教我”，正表现出孟子自居于师位的态度。

3. 君主对待有德有守、堪为精神导师的重臣，必须给予充分的礼遇。《孟子》中，多处记述有关礼遇的事情，如汤三顾伊尹之善举、鲁君慢待子思之失德等，并因之提出了“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”的观点，主张“君欲见之，召之，则不往见之”，“王公不致敬尽礼，则不得亟见之。见且由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孟子本人与各国君主打交道时，正是恪守这一原则。当齐王托病不肯登门而召孟子上朝时，孟子便同样托病不去朝见，并就此发表了“君必尊德乐道”、必“学焉而后臣之”的一篇宏论。

整体观之，孟子的“帝王师”主张表达了一种人生理想：既入世辅佐君主以建功立业，同时又维护自己的人格与道术的尊严。这与其重义、民贵君轻、大丈夫等思想观点紧密相关，也是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产物。战国之时，士无常主，因而也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。孟子得以“说大人则藐之”，实根基于此。后儒批评他“未能尽脱战国策士之习”，虽为偏隘之见，却也事出有因。

汉初，随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与巩固，君权日重，而儒者社会角色亦渐异于孟子的时代。其时以儒术用事者，首推叔孙通与公孙弘，司马迁述其行事皆有微词。如谓：“叔孙通儒服，汉王憎之；乃变其服，服短衣，楚制，汉王喜。”“（鲁生斥叔孙通曰）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谀以得亲贵……吾不忍为公所为……公往矣，无污我。”又历载公孙弘两面三刀以邀宠幸之事：“每朝会议……不肯面折庭争……习文法吏事，而又缘饰以儒术，上大说之”，“尝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倍其约以顺上旨”，“……弘推其后，天子常说”。